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

——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景晓强 景晓娟

摘要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身份建构 行为体 施动性 社会化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

身份(identity)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观念。“我是谁”决定了“我想要什么”(利益)和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作为人类群体政治的集中反映,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群体性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①的政治。身份关系到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在国关领域,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身份已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②身

* 景晓强,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陆军航空兵学院基础部讲师(北京 100087);景晓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讲师(北京 100102)。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尹继武博士提供的资料帮助。文章可能存在的谬误由作者本人负责。

① 本文主要研究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下文中所有的身份皆指国家或地区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身份,角色身份与个人身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② Yoseph Li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6.

份研究的文献数量和理论精致化程度都有了空前发展,^①身份研究几乎成了“最具有政治意义,对行为影响尤甚的因素”。^②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事实。在社会事实的建构中,行为体(agent)在社会情景中发挥作用,通过社会实践以发挥其施动性(agency)。但行为体也具有反思性潜能,其社会实践的结果可能会再造结构,也可能对结构进行变革。^③要理解施动性,关键在于明确行为体的社会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建构了社会事实。^④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谁是身份建构的主导行为体?行为体建构身份的动机和战略是什么?行为体的施动性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后果?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取向:一部分学者依托社会学中的社会化概念,另一部分则受心理学中社会身份理论的启发。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两者进行比较,评介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方向。

一、社会化理论:行为体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

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适应社会规范的过程。具体而言,社会化是指社会化者(socializer)通过一系列机制影响被社会化者(socializee),其目标是使被社会化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行事。社会化机制一方面涉及社会化者所采取的战略手段,另一方面也关系到被社会化者接受某种身份的内在驱动。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曾经把社会化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 社会化机制

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就像市场结构一样充满了竞争,无政府状态的过滤效果和国家的试错性学习,使安全自助和权力平衡政治成为国家的基本行为方式。^⑤过滤的结果是区分强者和弱者,弱国学习强国以增加实力,实现安全自助。国家的存亡系于能否在权力竞争中取胜。社会化成功与否的奖惩就是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化的结果便是,更多的国家参与权力竞争,国家身份趋于同质化。

在自由主义视野下,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自由主义视野中的社会化分为两种:一种发生在霸权国主导下,是国际制度主导下的社会化。另一种

① Rawi Abdelal et al., "Treating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APSA, August 30–September 2, 2001, San Francisco www.aljacademic.com, last access 08-20-2009.

② Rogers Smith, "Identities, Interes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4, p. 302.

③ Colin White,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10–212.

④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 47.

⑤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103页。

发生于霸权之后,是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在第一种情况下,作为社会化者,霸权国通过军事压力或者利益诱惑,使弱国按照国际行为规范采取合作行为。^①而在霸权之后,国际组织成为社会化的教化者。为了使国家符合国际组织的行为规范,社会化的关键就在于对被社会化者进行物质奖惩,从正反两方面强化国家行为。而被社会化者,也正是在进行物质收益的战略计算后,才接受行为规范。^②由此可见,无论是霸权主导还是在霸权之后,社会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如何进行物质性激励。

建构主义尤为重视社会化研究。主流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规范如何传播。^③作为“教师”,国际组织和规范倡导者对国家进行说服和教育,宣传国际规范的适当性和合法性,使国家意识到按照国际规范行动是一种适当的行为。说服教育和沟通是社会化的重要机制,其目标在于改变被社会化者的认知结构和信念系统。社会化成功的关键在于国际组织能否建构起作为教师的权威性角色,以及说服教育沟通的技巧。追求行为的适当性而不是物质收益的最大化,是国家接受身份的内在驱动。身份本身就是追求的目标,尽管有些身份的获得会造成物质利益的损失,国家也在所不惜。

针对主流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理论,批判建构主义运用福柯的权力知识论和萨义德的殖民主义话语分析,解构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背后的权力背景。^④在批判建构主义看来,任何一种规范都是一种特定的表象,社会化的实质就是通过话语霸权,把特定的身份强加给国家,如文明对野蛮、民主国家对流氓国家、正义国家对邪恶国家等。在话语强制中,弱势国家成为社会化的客体,只能按照话语霸权的语法来参与世界政治。^⑤(参见表-1)

表-1 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行为体施动性

理论流派	社会化者	社会化机制	
		社会化者战略	被社会化者接受身份驱动力
结构现实主义	军事强国	生死过滤	安全
自由制度主义	霸权国与国际组织	物质奖惩	利益
体系建构主义	国际组织	说服教育	适当性
批判建构主义	话语霸权国家	规训框定	适当性

① John G.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 289. 钟龙彪:《国家社会化:国际关系中的一项目研究议程》,《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92—137页;刘兴华:《试析国家社会化的演进》,《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71—82页。

② Frank Schimmler, "Strategic Calc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mbership Incentive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827—861.

③ 秦亚青:《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75—80页。

④ 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韩志立:《批判建构主义》,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

⑤ Roxanne Lynn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二）行为体通过社会化再造结构

尽管有不同的社会化逻辑，但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在社会化过程中，这些行为体共同实现了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本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结构概念。社会生活发生在不同维度的稳定的系统平台之上，权力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都是结构的不同侧面。^①

第一，区分社会化者与被社会化者。在社会化理论中，行为体按照特定的标准被强制性区分。这些标准分别是军事权力、经济实力、道德地位、话语地位。其中的强者往往是社会化者，主导社会化过程，而弱者则成为被社会化的客体。社会化从一开始就蕴含着行为体之间内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就是弱者主导身份建构过程的可能性被剥夺。

第二，社会化者再造结构。强势群体主导社会化过程，这些社会化者要么是军事强国、经济强国，要么是话语强国，在它们主导下，通过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结构，社会化结果强化了它们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地位。结构现实主义的社会化赋予强国优势地位以合理性。体系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社会化结果则是，所有国家都去追求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模式。批判建构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都遵循强者为我们设定的世界政治语法，强者对事物的理解框架成了所有人的理解框架。因此，社会化理论中的西方普世主义倾向表明，社会化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是服务于各类强者的知识。社会化者的权力不是用来改革，而是强化一元化国际秩序，社会化者本身的目的就是再造结构。

第三，被社会化者再造结构。虽然出于不同的动机，被社会化者接受了身份，内化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大多数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期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些学者把社会化理论直接界定为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同质化。^② 被社会化者对体系规范的遵守，进一步强化了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性。因此，同社会化者一样，被社会化者作为行为体同样强化性地再造了结构。

因此，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它们都成了稳定结构的行为体，施动性的社会后果就是对结构的再生产。

（三）社会化理论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化不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结构现实主义社会化失败的最为生动的例证。生死过滤的结果并不是中国的暴力崛起，相反，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伊朗、朝鲜等国从来不接受美国通过话语霸权强加给它们

^①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pp. 174–176. 国内学者也指出了从广义意义上谈论结构的必要性，参见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② Fred Halliday, “Languag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Burke Marx Fukuyama,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1992, pp. 435–461.

的“流氓国家”身份。而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在东盟地区的传播也受到了阻滞。^①在物质诱惑、说服、军事压力和思维规训都失效的情况下，社会化理论不能概括身份建构的所有路径。小国、弱国也可以成为重要思想的生产者，身份也并不必然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其次，社会化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原创性身份。冷战结束后，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进行社会化，但是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出现并没有一个强者的教化。同样，冷战后东亚合作也是出于东亚国家的主动倡导和自愿参与，而不是社会化的结果。再次，在社会化理论中，身份总是给定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行为体的施动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实践中践行被给予的身份。建构主义虽然最初提出身份可变的主张，但是即使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理论，也大大压缩了行为体的自主性空间。而社会身份理论恰恰能够在上述方面超越社会化理论。

二、社会身份理论：行为体变革结构的可能性

社会身份理论是把群体身份建构作为研究中心的心理学流派。^②这一理论从群体身份的建构开始，拓展到群体间关系，勾勒出独特的身份建构过程。社会身份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即群体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建构过程。^③社会身份不仅仅是群体的自我概念，而且也是群体内成员共同努力的进程。^④对于行为体自我建构身份的原初动力和建构战略，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社会身份理论的解释。

（一）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身份建构过程

第一，自尊驱动下的身份建构。社会身份理论接受心理学界对于自尊的普遍性假定。在此基础上，把人类追求群体身份的动力直接归因于自尊的需要。^⑤自尊包括对自我积极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作为一种群体分类标志，社会身份是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的结果。^⑥在自尊需要的驱动下，我们倾向于在特定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而且对群体内的成员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这

① An jian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Spring 2004 PP 239-275.

②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流派。最初由亨利·泰费尔(Henri 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创立，鲁珀特·布朗(Rupert Brown)与迈克尔·霍格(Michael Hogg)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其至今仍在发展之中。Rupert Brow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No 6 2000 PP 745-778.

③ Michael A. Hogg et al,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Intragroup Relations, Self-conception and Small Groups”, *Small Group Research* Vol 35 No 3 2004 PP 246-276.

④ Marilyn Bryer “Many Faces of Social Ident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2 No 1, 2001, PP 115-125.

⑤ 关于自尊与社会身份的关系，可进一步参考 Michael A. Hogg et al,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Intragroup Relations, Self-conception and Small Groups”, PP 246-276. Ronald J. Fish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ragroup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0.

⑥ H.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ra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1-30.

样,就产生了不对称的群体评价和行为,并偏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即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世界政治中的群体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群体,群体分类在短时间内很难变动,历史文化积累塑造了世界政治群体分类的稳定性。而主权国家归属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群体身份。^①

积极区分驱使群体内成员希望本群体在群际社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世界政治中,每个国家都希望在国际社会享有相对的优势地位。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建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越之处,并以此作为本群体的标志性特征,即群体身份。国家或者地区共同体领导人的责任,就在于建构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政治身份,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使其成员获得一种集体尊严。享有在国际社会的尊严是每个国家的基本目标,社会身份理论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身份建构战略。

第二,身份自主建构的战略:社会流动、社会创造与社会竞争。^②在群际比较中,当群体成员的独特性得不到社会承认,即出现消极区分时,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与群体自尊,人们往往采取社会竞争的身份战略,直接与强势群体进行竞争与对抗,如示威游行、政治游说,甚至进行革命和战争等。众所周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原教旨主义。还有一些社会竞争则通过温和的方式实现。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民大会掀起的废除南非种族隔离运动,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竞争。东盟对于“东盟方式”的追求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竞争策略,通过强调东盟自身的独特性,来提高东盟在国际社会诸多群体中的地位。^③

弱势群体获得群体尊严的另一个重要战略是社会创造。当一个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时,该弱势群体可能会重新选择一种有利于本群体的评价标准,从而保持本群体在群际比较中的优势地位。拉森在《通向伟大的捷径》一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造。^④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动“星球大战”计划后,苏联在与美国的军事竞争中败下阵来,经济也陷入了衰退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希望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提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新使命”,则有助于保持苏联的国际地位。通过社会创造这样的社会身份改变策略,在综合国力下降的情况下,苏联改变了社会比较的评价标准。苏联与美国社会比较的标准不再是经济与军事实力,取而代之的是维护和平的“全球人类新使命”。借此,苏联人仍然保持了积极的群体身份。社会创造不仅仅表现在选取一个新的评价标准,而且表现为扩大或者缩小群体界限。对于欧洲人来讲,欧洲联盟的成立就扩大了内群“我们”的范围。

① 虽然人们对主权的忠诚受到来自上方的国际组织和下方的分裂主义行动的影响,但是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缔结以来,除了少量移民之外,固定领土上的人口基本固定化,主权国家是群体身份的主要代表。

② 具体的心理学理论详见王沛、刘峰:《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5期,第822—827页。

③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3, pp. 303—304.

④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tchenko, “Short Cut to Greatnes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1, 2003, pp. 77—109.

我们对原来国家的认同,扩大到对欧盟这一地区共同体的认同。

在弱势群体身份建构的前两种战略中,社会竞争是保持原来的身份特征,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社会承认,而社会创造则是否定原有的身份特征,创造出新的身份获得社会承认。第三种战略也在于否定旧有的自身身份特征,只不过其不创造新的身份特征,而是学习优势群体,采纳别人的身份特征,即社会流动。如果商业人员认为知识分子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会通过学习和教育,在工作选择、言谈举止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努力向知识分子靠拢。具体到世界政治中,福泽谕吉等人提出的日本“脱亚入欧”,特别是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社会流动的典型代表。^①在“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改革日本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努力向西方国家靠拢,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参见表 2)

表 2 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的行为体施动性

主导行为体	建构身份内部驱动	身份建构战略
弱势群体	集体自尊	社会竞争
		社会流动
		社会创造

(二) 身份自主建构与结构变革的可能性

第一,社会分类的自主性和社会比较的动态性。在社会化理论中,行为体被区分为社会化者和被社会化者,这是按照特定标准的强制性分类。社会化理论并不否定社会比较中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地位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引发的不平等。而在社会身份理论中,无论强弱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每个群体在争取积极区分的过程中,都可以灵活选择社会比较标准。选择谁作为比较对象,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群际区分,使本群体因其独特性而获得尊严感。这些都是行为体的主动选择。在冷战之前,苏联人对苏联的身份认同,总是在与欧洲(西方)的社会比较中实现的。^②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曾经是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比较标准,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身份为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感,这种身份使苏联人获得了国际尊严。而在冷战结束前后,戈尔巴乔夫提出维护和平的“全球人类新使命”,此时,苏联人想借此保持积极的群体身份。对于社会身份理论而言,无论强弱,身份都是基于群际比较的自主社会建构。

第二,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群体间关系的稳定是结构稳定的前提条件。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群际关系永远处在一种动态的竞争当中。竞争关系是国际群际关系的重要形态,竞争的主要目标就是打破不平等,阻止任何群体主导国际社会,垄断

^① Tadashi Anno “Collective Identity as an Emotional Investment Portfolio: An Economic Analogy to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Rudira Sil and Eileen M. Doherty eds., *Beyond Boundaries: Discipline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p. 117–141.

^② Iver B. Neuman, *Russia and the Idea of Europe: A Study i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6.

国际体系的结构资源,如军事和经济强权、道德规范的普世性。社会身份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个体自尊驱动下的主动选择,源自于群体尊严的竞争。竞争并非仅仅出于安全或者经济考虑,也不是自私或者资源有限性所致,而是社会比较、分类和追求积极的社会身份的结果。^① 竞争既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强制性的,而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围绕什么而竞争,则是人为建构的结果。^② 总而言之,国际体系并不是按照强者的逻辑来运行的。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世界政治中的重大变革都与社会比较新标准的创造分不开。人类曾经以部落、宗教、国家、地区共同体等标准来区分不同的群体。在社会评价方面,领土、武器、财富、人口、个人福利、民主程度、经济组织形式等等都曾是“我们”与“他们”进行群体积极区分的标准。而实现群体尊严就是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比较标准,这也为结构变革创造了契机。作为人类追求群体性尊严的一种方式,群体间的区分和竞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助推器。基于群际比较的身份自主建构,为结构的变革提供了可能性。社会身份理论最佳独特性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试验也表明,群体具有持续的竞争动力。当一个群体通过社会流动,认同一个规模更大、更具包容性的群体的时候,由于这种群体成员资格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个体为了追求独特性,会认为自己所属的次群体才是大群体真正的代表,小群体之间的区分和竞争再次发生。^③

由此,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行为体不是强化性再造结构,其施动性集中表现在促成结构的开放性变革。

三、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结构—行为体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争议话题。一般学者讨论的中心是考虑哪种因素是影响行为的第一推动力。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解决这个鸡蛋互生的理论困境,而是重点考虑行为体对结构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集中研究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问题。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按照特定标准,行为体被强制性地分为不平等的社会化者和被社会化者,社会化者采用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社会化机制推动社会化,而出于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考虑,被社会化者可能会不同程度地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都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的社会分类、社会

①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Spring 1995 P 246

② Ibid, P 252

③ Brian Greenhill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2 2008 PP 343-368

比较都是主动选择。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为结构的变革创造了可能。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展现出行为体施动性的不同层面,在施动性框架下比较各种身份建构过程,不仅能深化我们对施动性的理论理解,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辨识各种身份建构战略的特点,以便在参与群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发挥出行为体应有的施动性。

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分别强调了身份建构过程的不同侧面。在世界政治的现实中,社会化过程总是与自主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它们就像紧密交织的双螺旋体,共同编织着人类自我定义的基因链条。国际社会演化的方向,就取决于多种身份建构战略的合力。

当然,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正如社会身份理论的创始人泰弗尔所说,有些群体(社会认同)战略旨在获取积极的群体独特性,有的则致力于改变或者保持现状。在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社会认同)战略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而理解这些复杂关系又必须理解另外一组关系,即在群际关系和群体归属的背景下,社会信仰的产生与扩散和社会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①换言之,我们不仅要继续研究国家建构不同身份路径的条件,还要研究社会化多种路径和身份自主建构多种路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这种交互关系已经开始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互模型(Interactive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②在国际关系中,研究类似身份建构的交互模型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社会承认是联系这两类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社会化进程中,被社会化者要承认社会化标准的合法性,社会学习的成效要取决于社会化者的承认。比如申请加入WTO首先是申请加入者承认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而申请国符合不符合这种身份,其行为表现要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直到获得承认。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自主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区分,驱使群体内成员希望本群体在群际社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并不是一种完全的主观臆想,对本群体、本国的肯定必须依赖于社会承认。国家可以维护和创造身份,但这个身份是否能够作为本国稳定的积极标志性特征,关键在于其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如在冷战初期,第三世界召开了万隆会议,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行动选择是发起国创造的一种新的国家身份。美国曾经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就是不承认这种身份。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一身份获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现已成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任何路径的身份建构过程,社会承认都在其中发挥了

① Rupert Brow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p. 745-778.

② T. Postmes et al., "Social Influence in Small Groups: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6, No. 1, 2005, pp. 1-42.

重要作用。霍耐特就指出,社会竞争的道德律则在于“为承认而奋斗”,^①国际社会同样如此,对社会承认的深入研究,无疑会推动身份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一旦我们把相互社会承认作为身份建构研究的重点之后,身份建构过程就不再完全是行为体可以主导的过程,^②这将对行为体施动性研究的重大挑战。无论是社会化理论还是社会身份理论,都假定了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主导性。前者关注强势国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后者则认为行为体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成为身份建构过程的主体。这两个过程都是主体主导的过程,主体作为过程的肇事者,有目的地给予过程以动力。而一旦我们把相互社会承认作为身份建构研究的中心,任何一个行为体都无法单方面主导过程,身份建构的过程就成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再者,无论社会身份理论还是社会化理论,都假定了身份建构过程是一个类别化的过程。社会化过程开始于分类区别社会化者和被社会化者,而社会身份理论强调,身份建构是群体间比较分类的结果。近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探索也发现,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关系化”而非群体化或者类别化,是身份建构的另外一种路径。^③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身份研究中,以关系为本位的过程建构主义,则关注非主体主导过程。过程是自在的,过程能够产生自身的动力。流动的关系塑造过程动力,关系确定身份。行为体置身于关系复合体中,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其身份也会得以塑造和再塑造。变化是事物的本真属性,变才真正表现了关系中个体的“身份”。这是关系建构主义身份建构理论与西方身份建构理论的根本区别。^④在关系确定身份的过程中,没有了主体的先在性和独立性假定,社会承认与身份建构过程将会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这也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Axel Honneth and Joel Anderson: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② 雷切尔将过程分为可主导性过程和不可主导性过程。Nicholas Rescher: *Process Metaphysics: An Introduction to Process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转引自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③ 杨宜音:《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48—159页。

④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69—86页。